

二、高等教育具体质量标准

显然, 正确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人才质量, 不可能撇开高等教育大从化这一概念。1998 年 10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在《21 世纪的高等教育: 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重申了 1993 年有关高等教育的定义: 高等教育包括“由大学或由国家主管当局批准为高等院校的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类中学后的学习、培训或研究培训。”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这一概念在外延上更加宽泛, 在内涵上更加丰富, 它已与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等同义。如果说我们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全部理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精英教育, 那么现在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则应当包括英才教育、大众教育(包括由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的中学后层次的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等)。

由此可见, 当高等教育达到马丁·特罗所说的大众化阶段时, 显然不是指培养 15% 以上的英才人物, 而是指培养层次和类型更加多样的各行各业所需的专门人才。与此相应, 高等教育机构已不是过去单一的精英教育机构, 而是如马丁·特罗所说, 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并存。

这种格局的变化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如包括教育观念、教育功能、教育模式、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诸方面。对此, 马丁·特罗早在其传世之作《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就有所阐述: 量的增进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传统上一直存在矛盾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高等教育, 在大众化阶段是可以并存的。

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发展,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的特

点, 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 也需要培养懂管理懂技术的应用型人才, 还有大量的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掌握一定职业技能的较高层次人才等。可见大众化高等教育必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交叉性的教育格局。

由此来看, 作为评价大众化高等教育人才质量的具体质量标准, 就应当视学术性与职业性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而有所不同。既不能用学术性标准来评价职业性高等教育的质量, 也不能用职业性标准来评价学术性高等教育的质量。应当允许不同办学层次、不同培养目标、不同社会适应面的高等教育有不同的质量标准, 允许培养规格、层次、类别、定位等有所差别。总之, 只要能够办出特色, 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专业人才, 就是好的教育质量。正如《21 世纪的高等教育: 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第 11 条(a)中所指出的,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质量标准要“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

综上所述, 评价高等教育的人才质量, 既有一般质量标准, 又有具体质量标准。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查, 就能够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

高等教育质量: 世纪之交引起关注的原因

赵叶珠

(厦门大学高教所, 厦门 361005)

对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 60、70 年代, 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纷纷担忧规模扩大以后能否维持一定的水平和水准。因为量“少”往往与质“精”相伴, 量“多”往往与质“滥”相连。此时, 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

施确保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准, 主要是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新增加部分质量的水准。如 1964 年英国成立 CNAA, 其主要宗旨便是为了确保高等教育新形式——多技术学院的质量与水准。日本也于 60、70 年代颁布《修学校设置基准》、《高等专科学校设置基准》、《短期大学设置基准》, 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持高等教育新增加部分的质量和水平。也就是说, 60、70 年代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心主要是源于高等教育内部的因素变化——高等教育自身规模的扩大而引起的。到了 80 年代, 情况发生了变化, 人们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心更主要地是源于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外部原因。试分析如下:

一是财政方面的原因。70 年代后, 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 各国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政府对支付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庞大的公共开支感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 削减教育经费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据资料,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除少数几个外, 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的比重多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如从 1975 年到 1986 年,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 除挪威、瑞典和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外, 大多数国家均呈下降趋势。丹麦从 7.8% 下降到 7.5%, 荷兰从 8.1% 下降到 7.0%, 加拿大从 7.1% 下降至 6.5%, 美国从 5.5% 下降至 4.8%, 日本从 5.4% 下降至 5.0%, 联邦德国从 5.4% 下降至 4.2%, 英国政府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 1980 年的 5.6% 下降到 1986 年的 5.2%。^[1] 各国教育经费减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教育投入的不足, 教育质量出现滑坡。同时,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仅在教育领域内, 除高等教育之外, 尚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 而其中高等教育最为昂贵, 其生均成本一般为初等教育的 5 至 40 倍。^[2] 因此, 政府在本已紧张的公共开支中, 拿出不菲的资金投入高等教育, 必然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出更高

的要求, 以确认花这笔钱是“物有所值”。

二是对平等与效率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 (Okun, A. M) 1975 年在其《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深刻地指出了社会在经济上平等与效率难以兼得的困境。其实, 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平等与效率的两难问题。而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此消彼长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民主化的社会思潮。这种教育思潮在教育上的反映便是将教育机会看作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效率位居其次。基于此种认识, 60 年代西方国家的教育政策普遍向教育公平倾斜, 着重于教育规模的扩张, 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和要求, 缓和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矛盾。但是, 自 70 年代末期开始, 由于世界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人们对教育在竞争中的独特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加之对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反思, 比如, 为什么 60、70 年代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繁荣? 为什么一方面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数量是可观的, 另一方面急需的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又十分短缺?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后果却反而招致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待业问题? 为什么雇主们抱怨毕业生“眼高手低”、学非所用、能力较差, 不能够为其企业作贡献? 等等, 导致西方社会对教育平等和效率的看法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 开始向效率倾斜, 因而, 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整个教育世界关注的焦点。

三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质量提出的要求。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有着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教育理论根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虽极为丰富, 但是, 国家之间人员的交流、项目的合作以及为研究和教学提供国

际化的环境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就人员交流与项目合作而言, 要真正有效地开展人员与项目的合作与交流, 相互间必须以一定的质量为先决条件, “必须确定国际公认的可资比较的质量标准”。比如, 人员流动的前提是相互间学历与资格的判定与确认, 这其中就是以质量为前提条件的。就提供国际化的环境而言, 须致力于使高等教育机构有理解、欣赏和接受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现实的能力(环境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 “高等教育机构有条件、责任通过教学和研究提高认识和理解在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的冲击中, 在本国和国家之间发生的、新的不断变化的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象”。^[3]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还必然带来在教育“市场”中国家之间对教育资源和学生生源的激烈竞争, 而要想在竞争中取胜, 质量是最为根本的保证。

总之,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一方面反映出质量本身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反映出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 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日益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所以, 从宏观上探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 尤其是探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原因, 也许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与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实质与内涵。

参考文献

- [1] 许明, 胡晓莺. 当前西方国家教育市场化改革述评[J]. 教育研究, 1998 (3): 69-74
- [2] 官风华. 国际高等教育拨款机制的理论与实践[J]. 教育研究, 1995, (12): 29.
- [3] 黄建如译.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历史与概念的考察[J].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0 (2): 1~7.

高校扩招应注意 保持规模与质量的统一

何秀成

(广东工业大学高教所, 广州 510090)

1999 年和 2000 年我国高校超常规性地扩大招生规模, 可以认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结果。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面对发展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 面对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激烈的国际竞争, 以及我国即将加入 WTO 的机遇与挑战,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的增加, 无疑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就此而言, 我国高校在这种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中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扩大招生规模, 对国家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是有益的。这样做既延缓了就业的压力, 尽量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求, 使更多青年获得深造的机会, 缩短了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 同时, 国家在高素质人力资源总量方面也获得了提高, 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是有利的。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 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应该是相互依存和互动的, 特别是规模和质量, 更是不可忽略的要素。规模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 必须有质量的保证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也只有在规模和质量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专业结构、层次以及布局的调控, 才能体现效益。也就是说,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长, 必须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 否则, 对学生本人和国家都是不利的, 会造成办学效益的下降和教育资源与投资的浪费, 也会使学校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受损。1999~2000 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 质量问题是否受到影响? 是否可从深层次上对办学规